

《百家註分類東坡詩》評價之再商榷 ——以王文誥註家分類說為中心的討論*

李 貞 慧**

摘 要

長久以來，在「書肆偽書」的既定印象之下，學界對《百家註分類東坡詩》（簡稱《百家註》）的評價，一直不出「網羅宏富，足供後人掇拾之資」的文獻功能。事實上，《百家註》是否全然是書肆偽託，不無討論的空間，而作為宋人註東坡詩僅存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其時代性，卻是後來即使在詮釋上更深微、更精當的註本或論說所無法取代的。本文即從此一觀點出發，論析清人王文誥對《百家註》所引用之註家——即所謂「百家姓氏」的分類說法，探討「百家姓氏」與王十朋、江西詩人及南北宋間重要學術、政治人物之關係，以重新衡定《百家註》在蘇軾研究史及宋代文化史上之價值，並掘發可能值得更進一步開發、探賸之命題。

關鍵詞：百家註 百家姓氏 王十朋 蘇軾 王文誥

94.4.6 收稿，94.10.27 通過刊登。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蘇軾詩文在北宋末年的流傳及其文化意義〉之部分研究成果（計畫編號：93-2411-H-007-025），謹此誌謝。

**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蘇軾(1037-1101)於北宋覆亡之前二十六年,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逝世於常州,然而不旋踵,注釋蘇詩的風氣,即已在北宋士人之間悄然興起。蘇軾研究史上著名的「十家注」,泰半皆作於北宋,¹如合南宋而言,則宋人注蘇詩,更不下數十家之多。當代人而注當代詩,時間如此之早、人數如此之眾多者,在中國詩歌史上,蘇軾恐怕是第一人,蘇軾之後,亦不多見。

宋人注釋蘇詩,流傳至今,只剩下兩項較完整的成果,一是舊題為王十朋(1112-1171)所作的《百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以下稱《王註》或《百家註》),²一是施宿、顧禧、施元之合力作成的《施顧註蘇東坡詩》(以下稱《施顧註》)。《施顧註》,自清康熙間重新出土以來,即素有「精審」之令譽,加上註釋中保留了相當多宋代史料,因而頗為學者所重。至於《王註》,雖然自南宋面世之後,先是託王十朋之盛名,後以呂祖謙之分類(見下文)、劉辰翁之批點,因而在金、元、明三朝流傳甚廣,加上元、明間《施顧註》未見傳

1 十家註,見下文。清人查慎行,《補注東坡先生編年詩例略》云:「茲集舊有八注、十注,同時稍後者有唐子西、趙夔等注」,見查慎行註,《蘇詩補註》(臺北:新文豐 1979 影香雨齋本),卷首。唐子西即唐庚,卒於徽宗宣和二年(1120)。據此,則十家注全是北宋所作。而如據劉尚榮先生,《宋刻集注本《東坡前集考》》,則五注本(趙次公、李厚、程續、宋援、林敏功)的編定者正是呂本中《江西詩社宗派圖》中的林敏功,見《蘇軾著作版本論叢》(成都:巴蜀書社,1988),頁 44-47。林敏功生卒年不詳,徽宗時賜號「高隱處士」,其《蒙山集》百卷,兵火後不存,而《宗派圖》中詩人多半亡於北宋末年,最後謝世的徐俯,則卒於南渡未久的紹興十一年(1141)。由於江西詩人之南渡者,多半可見於南宋人的記載中,而中不見有言及林敏功南渡以後情形者,意林敏功在北宋末年應即已亡故,若此一推斷不誤,則十家注中,亦至少有五種是成書於北宋末年。另趙夔,則於《序》中自陳其自北宋崇寧年間即已著手作蘇詩注。趙夔序見於《百家註》,卷首。此序《四庫提要》曾疑其偽,然之後清馮應榴、王文誥、胡玉縉、今人劉尚榮等,則批駁了《四庫提要》的說法,要之,《百家註》或許不是成於王十朋之手,但趙夔序卻並非偽造,因而也成為了解南北宋之間蘇軾詩流傳狀況的一篇重要文獻,詳見劉尚榮,《〈百家註分類東坡詩集〉考》,《蘇軾著作版本論叢》,頁 54-86。

2 此書例來標題略有出入,有稱「百家注」,有稱「諸家注」者,因現存最早的南宋建安黃善夫本題為「百家注」(在北京圖書館),故本文題目因之。而本文主要採用的版本,則是題為《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的四部叢刊本。

刻，於是造成《百家註》「孤行最久，幾於家有其書」的盛況，³然自《施顧註》重新出土翻刻以來，由於其詮釋方向、內容與《百家註》差異頗大，加上陸游為《施顧註》所作序文中，未曾言及《百家註》，兩相對照之下，於是先有邵長蘅、查慎行，繼有四庫館臣質疑《百家註》，四庫館臣更斷言此書「殆必一時書肆所為，借十朋之名以行耳」，⁴自是之後，雖有王文誥、阮元、傅增湘等以邵長蘅等未見宋版《王註》原刻，以及列舉王、施註異同得失等為之辯誣，但此書「坊肆陋書」，⁵「妄人所集」，⁶惟「利在風行」⁷的印象，已深入人群。論者固然承認其「未可全廢」，然「未可全廢」的理由，除了少數如王文誥以為《王註》實優於《施顧註》的說法之外，⁸多半不外乎「網羅宏富，足供後人掇拾之資」的文獻功能，至於其詮釋意旨，乃至於文本詮釋之外、如置之於宋代文化史上的價值，則幾無人問問。

不容諱言的，《王註》內容的確有失於舛雜之處，⁹因此王文誥以為此書惟謬在分類，「如以註論，猶以全牢任其攣割，割無不正」的說法，或許言過其實，但如將此書視為只是坊肆妄人惟圖利藪之作，也同樣有厚誣之嫌，而且這樣的說法，也很難解釋為何南宋以迄清朝的數百年間，眾多蘇軾詩的讀者之中，竟無人於此致疑，更何況其中還不乏學識淵博的學者。邵長蘅及四庫館臣的批

3 邵長蘅，〈注蘇例言〉，《施注蘇詩》（臺北：廣文，1978 影光緒南海孔氏覆刻古香齋本），頁 2。此本即是所謂的「邵長蘅刪補本」，與另一由藝文印書館出版，經鄭騫、嚴一萍兩位先生編校過之《宋刻施顧註蘇詩》不同。學界一般對「刪補本」的觀感、評價都不佳，詳見鄭騫先生，〈論邵長蘅刪補本〉，《宋刊施顧註蘇東坡詩提要》（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第七節，頁 24-32。

4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東坡詩集註》（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頁 3235。下引《四庫提要》版本同，不另出頁數。

5 鄭騫語，《宋刊施顧註蘇東坡詩提要》，頁 4。

6 日·小川環樹、滄田淳之助編，《蘇詩佚注》（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中國文獻學研究班，1967），〈凡例二〉，頁 1。

7 葉德輝，《郇園讀書志》（臺北：明文，1990），頁 911。

8 王文誥認為，就「注」本身而言，《王註》「猶以全牢任其攣割，割無不正；殆施註執乚，幾於伐毛而換髓矣」，《王註》其實是優於《施顧註》的。見清·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以下稱《總案》）（成都：巴蜀書社，1985），〈凡例〉，頁 2 上。本頁末段引王文誥言出處同上，不另註。

9 傅增湘：「平情論之，此注兼收博蓄，誠不免舛雜之譏，然搜采近百家，罔羅宏富，足供後人掇拾之資。」見氏著，《藏園群書題記續集》，收入《古籍題跋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卷 4，頁 597。

評不盡合理之處，學界已有論述，¹⁰此處不再贅言；而清人之中，維護《王註》最力的，則非王文誥莫屬，然其論點，則學界至今似未有深入加以評析者，因此本文即以其說入手，論析《王註》的相關問題，並試為其於宋代文學及文化史上的評價，重作衡定。

二、「百家姓氏」及其分類

《百家註》今存最早的版本，是南宋中葉建安黃善夫家塾刊十三行本（簡稱黃本，今存北京圖書館），自黃本以下，各宋、元舊刻本卷首，都有「姓氏」或「百家姓氏」一欄，標明《百家註》所引用之諸家，以黃庭堅為首，迄王十朋三兄弟止，實收九十六人，題署「王十朋纂集」，並列出了各家之姓名、字號及爵里等。百家中，趙次公等十家注，是在《百家註》成書之前即已完成的東坡詩完整注本，《百家註》中絕大部份的注文，即取材自這些注本，¹¹其他，則是由《百家註》作者搜羅各家對蘇詩信手記錄，以及隨機、零星之議論而成。¹²而必須先行說明的是，「百家姓氏」所收的九十六人，最晚到了清代，與見於注文者已有相當出入，因此清人又頗有據注文增列或「補正」注家名單者。¹³「百家姓氏」與注文所收不符的真正原因，迄無定論，但因《百家註》自南宋問世之後，即屢經增補，因而與各版本「百家姓氏」出入之注家注條，極可能即是後人增入者，唯此部分，一時之間難以詳考，因此本文所論，仍以各宋元版本卷首「百家姓氏」所收者為主，至於「百家姓氏」以外的注家部分，則俟來日再行補敘。

清人王文誥在《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卷首〈凡例〉中，曾對「百家姓氏」作出分類，筆者以為，這其實是清代康乾以來對《百家註》評價的論爭之中，最值得注意的觀點之一。王文誥以為百家「各以氣類從也」，而可分為數類：

自黃魯直、陳無己、蘇養直、劉無言、韓子蒼、潘邠老、潘仲達、秦

10 見劉尚榮，《蘇軾著作版本論叢》，頁66-68、84-85。

11 阮元：「今編年五註猶有存者，檢對龜齡集註，其入選者十有六七，亦惟此十家註獨賅備，與龜齡增輯諸家，繁簡懸殊。」見《總案·阮序》，頁1下。

12 王文誥：「百家自北宋迄南宋，上下八十年，勢不能齊之於一，內中多前人信手記錄，不標書名者，各疏所見，未能盡同……」，見《總案·凡例》，頁2上-頁2下。

13 見清·馮應榴輯注，黃任軻、朱懷春校點，《蘇軾詩集合注》（以下稱《合注》）（上海：上海古籍，2001），頁2702；及《總案·王註姓氏》，頁7上-頁8上。

少儀而外，曾空清（案：應作「空青」）為子宣子，李商老為公擇從孫，諸家並在門牆之列，是為一類。謝無逸、謝幼槃、饒德操、徐師川、何人表、王立之、汪信民、江端本、李希聲、晁叔用、楊信祖、夏均父、高還還，起自崇觀，終於南渡，此為魯直血屬，而三洪又其甥也，諸家由魯直而溯祖，是為一類。公北歸有贈張熙明詩，勉其子為實學，子即德遠也。劉彥沖、黃通老、劉共父、呂居仁、龔實之、呂伯恭，皆德遠氣類所聚，而敬夫又德遠子也，諸家南渡理學閥支大宗，是為一類。四註、五註已見次第，八註、十註即可類推。其趙堯卿、程季長、李德載、宋正輔、趙次公、林子仁、師民瞻、任文儒、孫瞻民、李唐卿十家，皆鼓旗相角，是為一類。王龜齡既總其成，丁鎮叔、張器先、孫彥忠、甄雲卿、項用嘉、葉思文皆與，而夢齡、昌齡又其弟也，諸家並起永嘉，因王一振，是亦一類。餘如王銍、汪藻之詞章，善權、正平之禪悅，並於北宋有聲；若胡邦衡、鹿伯可、張安國、馮圓仲、芮國器、吳明可諸人，又皆南渡登朝，多有忤賊檣而致禍者也。¹⁴

所謂「鼓旗相角」者，即是一般所謂的「十家註」。「十註」之名，宋元刻本《百家註》卷首所收、舊題為王十朋作之〈序〉中即曾提及，¹⁵而依上述王文誥的說法，其姓名依次為趙次公（彥材）、宋援（正輔）、李厚（德載）、程續（季長）、林敏功（子仁）、趙夔（堯卿）、師尹（民瞻）、任居實（文儒）、孫倬（瞻民）、李堯祖（唐卿）等。¹⁶然而這一份名單，卻一直有若干異說，如清人查慎行曰：

14 約莫同一時間，阮元為王編所作的序文中，也將「百家姓氏」分類。阮元的說法與王略有出入。由於阮序作於王文誥之後，當有受王說啟發之處，又與王文誥〈凡例〉所述大同小異，不僅就分類而言，未見具有獨特意義者，且刻意去除「因王一振」一類，其實是一大缺失，因而本文之論述以王文誥之《總案》為主，阮〈序〉則略記之於此，以備參照。

15 舊題王十朋，〈百家註東坡先生詩序〉：「予舊得公詩八註、十註……自八而十，自十而百，固非略矣，而亦未敢以繁言。」見《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首。

16 劉尚榮，〈宋刻集註本《東坡前集考》〉：「清人王文誥在《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一書卷首的〈百家注姓氏考〉中，曾對東坡詩的四注、五注、八注、十注以及所謂王十朋纂集的《百家注》，均有扼要說明。王文誥的意見有一定代表性，也有較大影響。」《蘇軾著作版本論叢》，頁44。

茲集舊有八注、十注，同時稍後有唐子西、趙夔等注。¹⁷

又馮應榴曰：

先生詩有四注、八注、十注及唐庚、趙夔、黃學阜、沈名失考諸本，皆不傳。¹⁸

都顯然是將趙夔排除在十注之外的。又如近年海內外孤本、宋刻集注本《東坡前集》出土，據大陸學者劉尚榮先生考證，宋刻集注本《東坡前集》乃宋代五注與十注的拼合本，在版本源流上，應是《王註》之祖本，而據此本，所謂的「十家注」作者應是趙次公、宋援、李厚、程續、林敏功、趙夔、師尹、孫倬，作《東坡紀年錄》的傅秀（叢刊本誤為傅藻），以及可能為胡仔或胡銓的「胡氏」。¹⁹各家所說的「十注」，是否即上述〈王序〉所說的「十註」，已無從得知，但十家註中，自趙次公至林敏功等五家的部分，清人的說法相當一致，而且也與上引宋刻集注本《東坡前集》吻合，這應與這五家註本較為早出，且直到清代，尚能得見若干宋刻《東坡集》殘本有關。²⁰而諸說出入者，唐庚、黃學阜之外，傅秀與任居實、李堯祖、胡仔、胡銓等皆在《王註》「百家姓氏」之內，傅秀所作之《東坡紀年錄》，甚至至今尚保存完整，因此所謂的「十註」，或許不無可能是後人對諸多宋人的《東坡詩註》，依不同的版本流傳，或註解功能，擇取若干以與五註結合，因而有不同的說法而已。惟對本文之討論，這樣的歧異，並無影響，反而從這個地方，更能證明《百家註》的搜集整理之功。

「百家姓氏」，除了上述「十家註」所引述諸家外，依王文誥的說法，則主要是由幾種身份的人組成：一是蘇黃之後學，所謂「諸家在門牆之列」、「由魯直而溯祖」者屬此；二是南渡後與閩學傳播相關的學者，而在王文誥的認知中，這些學者，亦與蘇軾有間接之關係；三是與王十朋相關者，也就是所謂的「因王一振」者；四是與於北宋即有文名而入南宋者，王銍、汪藻、僧祖可、善權屬之；最後，則是南渡初年，曾在政治上舉足輕重、「忤賊檜而致禍者」。

王文誥其實並未能跳脫爭辯王十朋作《百家註》之真偽的窠臼，但他對「百

¹⁷ 見註1。

¹⁸ 〈蘇文忠詩合注凡例十二則〉，《合注·附錄二》，頁2639。

¹⁹ 同註16，頁44-47。

²⁰ 如註11所引阮元云：「今編年五註猶有存者」，又馮應榴亦自稱曾見「宋刊五家注不全本，七卷。五家者，趙云（即次公）、李云（即厚）、程云（即續）、宋云（即援）、新添云（即林子仁）」，均是其例。馮應榴所見之五注本，只有《後集》，而未見《前集》，因此與今存海內外孤本之宋刻集注本《東坡前集》是否為同一刻本，已不可曉。見〈蘇文忠詩合注凡例十二則〉，《合注·附錄二》，頁2639。

家姓氏」的歸類，卻極具創見，為這本著作指出一個全新的詮釋方向——顯示這本書的編者並非一味貪博務多或附會逐利而已，在纂輯的過程中，編者其實已有某些價值判斷運作於其間。雖然所有的分類與由之而產生的建構與理解，都是人為操作的結果，難有定論，然而，如果深入查考南北宋之間的文學與學術社群，尤其是王十朋個人的交遊狀況，我們仍不難看出王文誥對諸家背景的分辨，其實明顯有所疏漏、偏頗，尤其刻意牽強比附「百家」中若干人與蘇軾的關係，以及理學中「閩學」的重要性，更可能使某些本可更清楚分辨編者學術背景，以及此《註》所反映的一些與文學相關的線索因而轉為沉晦，以下即試為論之。

三、由「百家姓氏」看《百家註》與王十朋之關係

「百家姓氏」所錄的九十六人當中，有四十五人（含王十朋在內，是四十六人），也就是近二分之一之數，曾見諸王十朋的《梅溪集》中，且與之有詩文往來，這是「百家姓氏」最值得重視、然至今似乎尚未為學界所注意到的地方。

王十朋，溫州樂清左原人，生於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卒於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六十歲，是南宋初年少數政事、文學俱卓越出群，在士林中極富聲望的名士，因而生前「朱熹、張栻雅敬之」，²¹身後則有汪應辰為其撰墓誌，朱熹代劉珙為其文集作序，葉適、真德秀為其祠堂作記，葉適甚至以為「自紹興至乾道，公（王十朋）名節為世第一」。²²四庫館臣則綜合了汪應辰、朱熹說法，而論其人品文章：

十朋立朝剛直，為當代偉人，應辰稱其為文專尚理致，不為浮虛靡麗之辭，其論事章疏，意之所至，展發傾盡，無所回隱，尤條鬯明白。珙（實為朱熹所作）稱其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為人。今觀全集，淳淳穆穆，有元祐遺風，二人所言，皆非溢美云。」（《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梅溪集》）

言簡意賅，也大致涵蓋了宋人對王十朋的主要觀點，因而坊間書肆託名王十朋而作《百家註》，似乎並不是不可理解之事。然而深入查考王十朋生平以及「百

21 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387，頁11886。

22 宋·葉適〈三賢祠記〉，引自《王十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附錄四〉，頁1129。

家姓氏」與其相關的四十餘人之後，筆者卻有不同的看法。

從王十朋一生經歷來看，他弱冠從學耆宿林師禹於金溪，二十七歲（1138）讀書明慶寺鹿岩書院，從潘翼先生學。三十二歲（1143）建學館於梅溪，朋友以其年居先，以師席見推，初從者十人，至庚午（1150），游從者通數一百二十二人。在紹興二十七年（1157）進士首魁之前，曾數度出入太學，之後正式步入仕途，十五年中，在中央曾任秘書省校書郎、司封員外郎、國子司業、起居舍人、侍御史等職，在地方則曾僉判紹興，出守饒、夔、湖、泉等州，²³而「百家姓氏」與王十朋相關的四十餘人，幾乎均可於此一一按圖索驥（詳見文後〈附表一〉）。

附表中，如胡銓（邦衡）、鹿何（伯可）、張孝祥（安國）、馮方（圓仲）、芮燁（國器）、吳芾（明可）等，俱為渡江之後名臣，而且固如王文誥所言，俱曾忤秦檜而致禍，因此《百家注》編者特別選錄此數人，雖然可能不無與政治相關的寓意在內（見下文），但他們都與王十朋有某種程度的往來，卻是王文誥略而不提的。這之中，吳芾與張孝祥在文學上與王十朋因緣頗深，尤其值得一論。吳芾「詩才甚富，往往瀾翻泉湧，出奇無窮」，晚年又有「和陶詩」三卷，「殊見閒適清曠之致」（《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湖山集》）；張孝祥之詩、文、詞，在南宋初年，均卓然成家，其詩大抵規摹蘇軾，「每作詩文，輒問門人視東坡何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于湖集》），二人的文學品味，與「瓣香韓、歐、蘇，而尤以韓為宗」²⁴的王十朋，其實頗有相近之處。而前者王十朋自弱冠識之，終身與之時有詩文往來；後者則於王十朋知饒期間，與王十朋等人所組成的「楚東詩社」往來密切，王十朋等曾將詩社唱和詩什編為《楚東酬唱集》（今佚），而為張孝祥故，甚至曾打算再作《後集》，以收張孝祥之詩。²⁵以此，筆者以為，吳芾、張孝祥之入選《百家註》，或許又不全是著眼於政治上的作為，其與王十朋文學上的往來，也可能是考慮的因素之一。

除了上述的名臣名家之外，「百家姓氏」中，另一最不應被忽略者，其實是一些名不見經傳、卻只能得見於王十朋詩文中的低階文士，王文誥所謂「諸家並起永嘉，因王一振」者，均屬此類，但據筆者之考查，「百家姓氏」中，

23 以上對王十朋生平的敘述，主要係參考〈王十朋生平紀略〉，《王十朋全集·附錄六》，頁1165-1194。

24 清光緒《樂清縣志》，引自《王十朋全集》，頁1152。

25 見王十朋，〈次韻安國讀《楚東酬唱集》〉、〈安國讀《酬唱集》有「平生我亦詩成癖，卻悔來遲不與編」之句，今欲編後集，得佳作數篇，為楚東詩社之光，復用前韻〉二詩，《王十朋全集》，頁314-315。

這一類人物實際上約有三十人之譜，換言之，與王十朋相關者有三分之二便屬此類，其數目遠超過王文誥所列舉的丁鎮叔等八人。這中間，有王十朋之鄉人、任職地方官時之僚屬、妻弟、表兄弟、遠房表親、鄉學同學、太學同舍、進士同年、從學於梅溪學館者、老於鄉曲之地方耆宿老儒等，絕大多數，於其他與宋代相關文獻中，已無從考知，但這些人，又不過是王十朋集中所呈現的交游圖象的一小部分而已，這不禁使人懷疑：雖然到目前為止，學術界並沒有百分之百令人信服的證據，可以證明《百家註》為王十朋所作，然而上述現象，卻顯示了《百家註》即使不是王十朋手訂而成，但也決非與王十朋毫不相干，否則實在很難解釋為何要擇取這些人，來作為作偽的目標。筆者甚至以為，《百家註》其實不無可能是後人根據王十朋輯錄之初稿或記錄所作成，只是這一部分，目前仍未從文獻中找到足資印證的資料，所以只能暫時存疑，以俟他日。²⁶

四、「百家姓氏」與江西詩派

所謂的「諸家在門牆之列」與「由魯直而溯祖」兩類，其實是以黃庭堅及江西詩派為主，並非如王文誥所以為，乃以蘇軾的交游從屬關係為搜羅之核心。最明顯的證據之一，是所收九十餘家，乃以黃庭堅為首，黃庭堅以前不收；又蘇門弟子最著名於世的「四學士」或「六君子」，除黃庭堅之外，只有陳師道入選，卻忽視了秦觀、張耒、晁補之等人。尤其收秦觀而不收秦觀，更突顯了《百家註》編者的此一意圖。蓋秦觀雖為秦觀之弟，不過卻與蘇軾相當生疏，²⁷但他曾接受黃庭堅的指點，「緣此詩思大發」，並因而知名士林，²⁸因此與其視其為蘇軾門牆，其實還不如將之歸於黃庭堅一派，可能更為恰當。

此外，《百家註》所收，又涵蓋了呂本中所作《江西詩社宗派圖》上的全

²⁶ 請參見下文第六節之論述。

²⁷ 秦觀、秦觀均為秦觀之弟。《宋史》及《東都事略》均云觀字少儀，觀字少章，然黃庭堅〈贈秦少儀〉詩云：「吾早知有觀，而不知有觀」，則秦觀字少儀，字少章者實為秦觀，而秦觀在秦觀友人中知名較晚，又由此可知。此詩《山谷年譜》繫於元祐四年，而是年五月蘇軾即出守杭州，之後轉徙各地，終至流落嶺南。因此秦觀縱使識得蘇軾，應該也很難有深厚之交誼，況蘇軾詩文中並未見有論及秦觀之資料。

²⁸ 《王直方詩話》云：「秦觀字少儀，好為詩，初亦不甚工。既而以所業獻山谷，山谷贈之曰：『乃能持一鉞，與我箭鋒直。』」又云：『自我得此詩，三日臥向壁。……才難不其然，有亦未易識。』當時交游以此言為過。然少儀緣此詩思大發，交游亦刮目視之。」收入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臺北：華正，1981），頁24-25。

部詩家二十五人（合黃庭堅是二十六人），²⁹其中包括了被歸於「並在門牆之列」的李彭（商老）、十家註之一的林敏功（子仁）、以及王文誥所謂以「禪悅」著名於北宋的僧祖可、僧善權等；另有林氏、字子敬者，馮應榴指為林敏中，³⁰王文誥更進一步稱其為「林敏功之弟」，惟不知其根據為何。³¹

至於亦被王文誥劃入「並在門牆之列」一類的蘇庠（養直）、曾紆（空青），其實亦與蘇軾關係疏遠，而與江西詩人往來密切。蘇庠（1065-1147）字養直，號後湖居士，是蘇軾友人蘇頌之族、蘇堅之子，然由於年歲道里不相及，因而雖曾因〈清江曲〉受蘇軾稱賞，「由是知名」，但與蘇軾的互動並不多，³²但他與江西詩人卻頗有淵源，呂本中《江西詩社宗派圖》中的僧祖可，正是其弟；³³徽宗崇、觀年間，他與乃父又曾在江西與徐俯、洪芻、洪炎、潘淳、呂本中、汪藻、向子諲等組成詩社，唱和之餘，亦以切磋詩技，³⁴其中又與黃庭堅外甥徐俯「尤為厚善」，因此周必大曾以「後湖居士，歌詩清腴，蓋江西之

29 《江西詩社宗派圖》的記載最早見於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臺北：長安，1978），卷48，頁327。所列二十六人為黃庭堅（魯直）、陳師道（後山）、潘大臨（邠老）、謝逸（無逸）、洪芻（駒父）、洪朋（龜父）、洪炎（玉父）（案：以上三人即三洪）、饒節（德操）、僧祖可（正平）、徐俯（師川）、林敏修（子來）、汪革（信民）、李錡（希聲）、韓駒（子蒼）、李彭（商老）、晁沖之（叔用）、江端本、楊符（信祖）、謝邁（幼槃）、夏倪（均父）、林敏功（子仁）、潘大觀（仲達）、何顗（人表）、王直方（立之）、僧善權、高荷（子勉，有《還集》）。其中林敏修「百家姓氏」中有之，但王文誥〈凡例〉未論及。

30 《合注·附錄二》，頁2700。

31 「百家姓氏」則將林敏修（字子來）之字誤為子敬，而以「林氏」之字為「子來」。

32 在蘇軾的詩文集中，只有兩處言及蘇庠，一是元祐間蘇軾守杭，蘇堅為錢塘丞，督開西湖，與蘇軾頗有唱和往來，蘇軾曾於此時贈硯與蘇庠，並為作〈端硯銘〉，〈銘〉中並稱許蘇庠「妙齡而有異才」，見《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19，頁552。另一則是建中靖國元年北歸時，曾品題蘇庠所作之〈清江曲〉，贊其「此篇若置在太白集中，誰復疑其非也」，見《蘇軾文集》，卷68，頁2160。

33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臺北：新興書局，1958）：「後湖集十卷，陳氏曰：丹陽蘇庠養直撰，其父堅伯固，亦有詩名……僧祖可正平，號癩可者，其弟也……庠，紳之後，頌之族。」卷238，頁1801。

34 張元幹，〈蘇養直詩帖跋尾六篇〉：「往在豫章，問句法於東湖先生徐師川，是時洪芻駒父、弟琰玉父、蘇堅伯固、子庠養直、潘淳子真、呂本中居仁、汪藻彥璋、向子諲伯恭為同社詩酒之樂。予既冠矣，亦獲攘臂其間，大觀庚寅辛卯歲也。」《蘆川歸來集》（上海：上海古籍，1978），卷9，頁173。

派別，而字畫健逸，又老坡之苗裔也」³⁵分別其詩文與書法之淵源，正可見蘇軾雖曾受知於蘇軾，但詩學上卻主要是受江西浸潤之特質。

曾紆（1073-1135）字公袞（一言字公卷），晚號空青老人，其父曾布，為曾鞏之弟、曾肇之兄。蘇軾兄弟與曾鞏、曾肇兄弟同為嘉祐二年進士，曾肇子曾縱（字元矩）又為蘇轍女婿，兩家情誼深厚，因而雖然後來曾布倚附新黨，在政治上與蘇軾兄弟、乃至其兄弟異論，但蘇軾與曾布仍不無往來，不過蘇軾集中完全未提及曾紆，因此若以「子宣之子」的身份即遽將曾紆置入蘇軾門牆之列，則恐有過度引伸之嫌。曾紆之文學，最初實得自於家學，父母之外，十三歲時，其伯父曾鞏又曾「授以韓愈詩文，學益進」，³⁶對他頗有深刻的影響。比較特殊的是，孫覿為曾紆所作的文集序中，清楚指出曾紆「學詩以母夫人魯國魏氏為師，句法清麗，絕去刀尺，有古詩之風」，³⁷魏氏即《東軒筆錄》及《臨漢隱軒詩話》作者魏泰之妹，魏泰雖然後來因為政治上傾向王安石、曾布等，因而論詩不免「黨熙寧而抑元祐」，但其實「少與徐忠愍及山谷等人友善，博極群書，尤能談朝野可喜事，亶亶終日」，³⁸對江西詩法，應不無理解。魏氏是否透過乃兄而得窺江西詩學，並傳于其子，不得而知，但曾紆的詩風則確實與黃庭堅相近，因而崇寧年間，黃庭堅徙宜州，曾過訪當時貶謫零陵的曾紆，得其二詩，書團扇上，諸詩人竟莫能辨；³⁹而且曾紆對黃庭堅「無一字無來歷」的詩法詩風似乎尤其心儀，亦頗有會心，但也正因如此，所以曾有「疑神疑鬼」、「草木皆兵」，而鬧了將黃庭堅默寫白居易而記錯的詩，誤為是「點鐵成金」之例的笑話。⁴⁰南渡之後，曾紆又與江西詩人韓駒、錢伯言等唱酬於臨川，周

35 周必大，〈跋周德友所藏蘇養直詩帖〉，《周益公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04）冊49，卷16，頁651。

36 汪藻，〈中大夫直寶文閣知衢州曾公墓誌銘〉：「公少穎悟，天資既高，又受學于賢父母，……年十三，伯父南豐先生鞏授以韓愈詩文，學益進。」《浮溪集》，見《四部叢刊》（臺北：商務），卷28，頁241。

37 〈曾公卷文集序〉，宋·孫覿，《鴻慶居士集》，見《四庫全書珍本》（臺北：商務）冊165，卷31。

38 潘淳，《潘子真詩話》，郭少虞輯，《宋詩話輯佚》，頁301。

39 孫覿，〈曾公卷文集序〉：「黃庭堅魯直遷宜州，當出零陵，得公〈江槎書事〉二小詩，愛之，書團扇上，諸詩人莫能辨也。」

40 事見宋·佚名，《道山清話》，周光培編，《宋代筆記小說》冊23，頁318-319。錢鍾書在《宋詩選註》（臺北：新文豐，1989）中，戲謂：「看來『讀書多』的人對黃庭堅的詩都疑神疑鬼，只提防平常的字句裏有什麼埋伏著的古典，草木皆兵，你張我望」，即曾引曾紆事以為例證之一。見頁112。

必大跋三人倡和詩，云：

崇寧、大觀而後，有司取士，專用王氏學，甚至禁讀史作詩，然執牛耳者未嘗無人，凡紹興初以詩名家皆當日人才也。今讀韓子蒼與錢遜叔、曾公衮等臨川唱酬，略可觀矣。

又云：

今觀曾公衮、錢遜叔、韓子蒼諸賢，又皆翰墨雄師，非有司尺度所能得也。紹興初星聚臨川，唱酬妍麗，一時傾慕……周某子充敬題其末。⁴¹

字裏行間，對曾紆等人充滿虔敬之意。要之，曾紆之詩學及交游，其實都是與黃庭堅、與江西詩派為近，直接將之視為「蘇軾門牆」，並不恰當。

由上文，可知「百家姓氏」九十六人中，與江西詩派直接相關而可計入江西詩人之列的，便有三十人，佔百分之三十左右，⁴²這中間還不包括崇觀間在江西與徐俯等結為詩社的汪藻，以及與呂本中交游密切，而詩風亦頗受江西詩派濡染的劉子翬等人。「江西詩派」的標舉，起於呂本中的《江西詩社宗派圖》，而且在南宋初年，也已成爲詩壇主流之一，但無論從當時的文學環境，或王十朋本身的文學主張來看，《百家註》如此標榜江西詩人，都有其微妙之處。就詩學環境而言，北宋的江西詩人雖然藝術取向與蘇軾不盡相同，但無論呂本中或《宗派圖》中所列詩家，無不尊崇蘇軾，然而宗蘇與宗黃，南宋初年以降，卻是各自形成不同的學術社群，這中間，有地域的因素，⁴³也有因詩學取向不同而群聚、乃至互相攻訐的問題，如南宋初年吳垞《五總志》云：

師坡者萃於浙右，師谷者萃於江右。以余觀之，大是雲門盛於吳，臨濟盛於楚。……噫！坡、谷之道一也，特立法與嗣法者不同耳。彼吳人指楚人為江西之流，大非公論。⁴⁴

即清楚揭露了宗蘇與宗黃，除了藝術上的分野之外，其實已不無爭爲詩學正宗

41 兩段引文皆見《周益公集》，《宋集珍本叢刊》，冊50，卷48，頁183-184。

42 王文誥另提及之劉燾，字無言，為蘇軾於元祐三年知貢舉所得士，惟宋、元版本之「百家姓氏」中並無其人，故本文不論。

43 如《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11，「紹興七年六月乙卯」條：「上又曰：『蜀中多士，幾與三吳不殊。』……因論士人各隨所習，如蜀中之士，多學蘇軾父子，江西之士，多學黃庭堅。」又卷150，「紹興十三年十一月戊寅」條：「……大抵川人多學蘇軾，如江西人盡學黃庭堅」，即主要是從地域看待當時文士學蘇與學黃的現象。

44 吳垞，《五總志》，收入《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1966），冊492，據吳垞

的私心或意氣在內。⁴⁵至於王十朋，在詩學上，他雖然主要是「瓣香韓、歐、蘇，而尤以韓爲宗」，但對黃庭堅評價亦高，⁴⁶對江西詩人，如韓駒，亦禮敬有加，有「近來江西立宗派，妙句更推韓子蒼」、「句法且學今陵陽」⁴⁷之語，不過在另一首〈讀東坡詩〉中，他卻清楚表明「學江西詩者，謂蘇不如黃，又言韓、歐二公詩乃押韻文耳。予雖不曉詩，不敢以其說爲然」，⁴⁸顯然是對南宋初年所謂的「學江西詩者」有所不滿。《百家註》雖然不見得即成於王十朋之手，但應與王十朋關係密切，甚至不無乃依王十朋之初稿或記錄作成的可能，此上文已論之，如此，則《百家註》中收錄江西詩人的比例幾達三分之一，而且又以《江西詩社宗派圖》爲主要之搜羅藍圖，或許便不是出於偶然。一來這有標舉江西正宗的意味，二來則又有以江西乃蘇軾法嗣，「坡、谷之道一也」，並以之作爲詮解蘇詩權威的作用，在宗蘇、宗黃已成一項重要議題的南宋詩壇，這其實是頗有調和蘇、黃的意義在內的。

五、「百家姓氏」與「理學閩支大宗」關係辨正

王文誥在〈凡例〉中，特別標舉「理學閩支大宗」一類，而以劉子翬（字彥沖）、黃中（字通老）、劉珙（共父）、呂本中（字居仁）、龔茂良（字實之）、呂祖謙（字伯恭）、張栻（字敬夫）等繫於此類之下，爲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作序的阮元也有類似的說法。⁴⁹王文誥所謂的「理學閩支大宗」，其實是以朱熹爲中心的，其中黃中、呂本中不在宋元版本的「百家姓氏」之內，出於後人增補的可能性甚高，故本文暫且不論，其餘則劉子翬爲朱子之

自序，乃作於南渡之初的建炎四年（1130）。

45 謝思緯，〈南北宋之際的政治學術分野與詩學分派〉於此論之甚詳，可參看，收於氏著，《唐宋詩學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234-251。

46 如稱黃庭堅「詩鳴配子美」（〈〈夔路十賢〉續訪得七人〉，《王十朋全集》，卷23，頁426），又云：「唐宋詩人六七作，李杜韓柳歐蘇黃」（〈陳郎中公說贈韓子蒼集〉，《王十朋全集》，卷11，頁170）等，俱可得見。

47 〈陳郎中公說贈韓子蒼集〉，《王十朋全集》，卷11，頁170。

48 同上，卷23，頁415。

49 阮元，〈序〉云：「南渡傳閩學者，爲劉子翬、黃通老、陳體仁、汪聖錫、龔實之、胡邦衡、劉共父、張南軒、呂伯恭、甄雲卿。」汪應辰（聖錫）、龔茂良（實之）、胡銓（邦衡）、劉珙（共父）、甄雲卿等，俱見於王十朋《梅溪集》中，因而雖然後人頗有將上述諸人亦納入廣義的「閩學」之列者（如清人李清馥之《閩中理學淵源考》），但《百家註》收入各家，應非著眼「理學」之故，見下文。

師，劉珙爲劉子翬之姪；阮元列入名單之內的陳知柔，字體仁，號休齋，爲紹興十二年秦檜子秦熹同榜進士，歷建州、汀州教授，知循州、賀州，以不附秦檜解官，教授諸生，「戶外屨常滿」，朱熹初入仕時，曾從之於漳泉之間；⁵⁰加上張栻、呂祖謙又是與朱熹往來密切的理學宗師，因而以爲《百家註》作者特別注意「理學閩支大宗」，而別爲一類，似乎不無道理。然而進一步查考《百家註》內容以及南宋的學術背景，不難發現，福建一帶，雖然一直是儒學鼎盛之地，南宋中期之後，更以朱熹之故，而爲理學重鎮，但《百家註》作者是否便因此而特別重視所謂的「理學閩支大宗」，其實不無疑問。其中最令人無法釋懷的一點是，如果《百家註》的作者果真有特意突出或標榜所謂「理學閩支大宗」的意思，那爲何忽略朱熹，反而與「理學閩支大宗」只有間接關係的呂祖謙、張栻俱入選其中？況且朱熹與王十朋間，又非絕不相及，如上文所述，朱熹不僅於王十朋生前「雅敬之」，於其身後爲其作〈文集序〉，而且還曾經直接上書王十朋。⁵¹以此而觀，所謂的「理學閩支大宗」，恐怕只是清人在理學籠罩之下，刻意藉理學爲《百家註》增價，或甚至只是下意識的強調理學的一種誤解而已。

撥除了所謂「理學閩支大宗」的迷霧之後，則對劉子翬等之被選入《百家註》的可能原因，或許就可以有不同思考。

劉子翬（1101-1147）字彥沖，號屏山先生，與朱熹父朱松交情甚篤，是朱松臨終前，囑熹「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的三人之一，因而朱熹終身以其門人自居，⁵²後世有關閩學的系譜，如明宋端儀《考亭淵源錄》、清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等，也莫不以劉子翬爲閩學淵源之一，這應該即是王文誥、阮元等特別注意「百家姓氏」中與閩學相關諸人的主要原因，但這樣的認知，並不盡然合理，此上文已論之。而還原到當時的時代背景來看，其實劉子翬不僅是爲南北宋間重要之學者，而且也是當時著名的詩人，無論是感時痛憤、寫亡國之悲的〈諭俗十二首〉、〈汴京紀事〉二十首、〈望京謠〉、〈四不忍〉等，或隱居後，「幽淡卓鍊，及陶謝之勝，而無康樂繁縟細澁之態」⁵³的作品，在當時及後代，都有相當高的評價；另外，劉子翬與江西詩人呂本中、韓駒亦往來密切，所以「七言近體，宗派頗雜江西」、「格律時復似之」（《四庫全

50 〈祭陳休齋文〉，宋·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卷87，頁4484。

51 引自《王十朋全集·附錄》，頁1187。

52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朱熹集》，卷90，頁4585。

53 清·吳之振等輯，《宋詩鈔·屏山詩鈔》（上海：三聯，1988），頁275。

書總目提要·屏山集》），其詩作流傳至今，也尚有六百多首。換言之，不論從劉子翬本身的學術聲望、背景或創作成就來看，他被《百家註》的作者注意，而選入百家之中，成為詮釋蘇軾詩的參考意見之一，都是相當恰當的，實在不須再迂迴透過所謂的「閩學」來抬高身價。

和劉子翬情況相似的，至少還有汪藻及王銍兩人。汪藻（1079-1154）是北宋間的詩文名家，更是最重要的四六大家，其四六文，宋人以爲「明徹高爽，歐、蘇之外，邈焉寡儔」，⁵⁴乃「中興第一」，⁵⁵建炎、紹興間一時詔令多出其手。他最知名的，是在板蕩中所作的代言之文，如〈隆祐太后布告天下手書〉、〈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等，在國家艱難危殆之際，以其「事詞的切」，而使「聞者悽憤」，「天下傳誦，以比陸贄」，⁵⁶「自海隅萬里之遠，莫不家有其書」，⁵⁷在當代的影響力可想而知。汪藻與江西詩人的淵源甚深，北宋崇、觀間，他曾在臨川與徐俯、呂本中、洪芻兄弟等組成詩社，相互唱酬，此已見諸上文，這之中，他受黃庭堅外甥徐俯的啓發尤大，每謂人曰：「某作詩句法得之師川」；南渡之初，汪藻又曾拜謁韓駒於臨川，稱韓駒「爲詩文一代之統盟」，而「願焚筆硯，以從公游」，⁵⁸敬慕之意，溢於言表，而其對江西詩人的服膺之深，亦由此可見。

王銍字性之，是南北宋間著名學者，其祖王昭素，爲北宋易經博士，其父王萃，從歐陽修學，王銍本身娶曾紆女爲妻，其次子則是作《玉照新志》、《投轄錄》、《揮塵錄》等說部名著的王明清，一家之學術淵博，屢見於宋人的著作當中。據傳南宋初年，王家「藏書數百篋，無所不備」，王銍死後，秦檜子秦熺曾幾次以禍福脅迫其子，欲巧取豪奪其家藏，尤可見其數代積累的驚人成果。⁵⁹王銍最爲宋人所稱道者爲其博學，尤其北宋人，幾乎不分黨派，眾口一詞，絕無異說。如蘇軾門下的趙令畤言其「少年博學」，甚至還曾舉聞之於蘇

54 宋·黃震，《黃氏日抄》（東京：中文，1979據日本立命館大學圖書館藏書影印），卷66，頁733。

55 元·方回，《瀛奎律髓》（臺北：藝文印書館，1964），卷25。

56 見宋人洪邁，《容齋三筆》，卷8、楊萬里，《誠齋詩話》、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3、陸游，《老學庵筆記》，卷4，以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之記載。此不一一詳引。

57 孫觀，〈浮溪集序〉，《鴻慶居士集》，卷30。

58 宋·吳曾，〈汪彥章敬慕韓子駒〉，《能改齋漫錄》（臺北：木鐸，1982），卷14，頁433。

59 清·陸心源輯，《宋史翼》（北京：中華書局，1991），卷27，頁295。陸心源的記載，則是濃縮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二及卷六之相關記載而成。

軾、卻不解其義的論詩之處問於王銍，可見其對王銍之推服；⁶⁰又如蔡條稱其「博洽士也」，其論宋祁《新唐書》不妥之處，曾令自負博學的蔡條亦慨歎「吾不能答」，⁶¹均是其例；惠洪在贈王銍詩中，至有「胸中撐拄萬卷讀，對客傾瀉如崩雲。不恨子未識和仲，但恨和仲未識君」之語，⁶²評價之高，可想而知。王銍以其家學之故，因此曾致力搜求歐陽修遺文，又曾在北宋末年文禁森嚴之時，參與搜集、討論並編修蘇軾集，蘇軾門人李之儀還曾為其所編集作序；⁶³南渡之後，在「典章一切掃蕩無遺，甚至祖宗諡號亦皆忘失，祠祭但稱廟號而已」⁶⁴的情況下，王銍又曾纂集「祖宗兵制」，⁶⁵作《哲宗實錄》元祐八年補錄、《七朝國史》等以進，⁶⁶另外，他還作有《四六話》二卷以評論宋人表啓之文，一聯一句之間，頗有推闡入微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六話》）——凡此，在當代都有相當高的評價。但王銍晚年頗作偽書，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至少已考訂《龍城雜記》、《雲仙雜記》為其偽託之作，朱子則疑《子華子》一書亦出其手，並對王銍之作偽抨擊不遺餘力，如《朱子語類》云：

柳文後《龍城雜記》，王銍性之所為也。子厚叙事文字多少筆力，此記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知底於其中，似暗影出。⁶⁷

又《偶讀漫記》則曰：

此子華子者……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偽書，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⁶⁸

60 宋·趙令畤著，孔凡禮點校，《侯鯖錄》（北京：中華，2002）：「東坡嘗言詩有佳者，誦一篇云：『流水涓涓芹吐芽，織烏西飛客還家。深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嘗不解織烏義，王性之少年博學，問之，乃云：『織烏，日也，往來如梭之織。』」卷2，頁61。

61 見蔡條，《鐵圍山叢談》，周光培編，《宋代筆記小說》冊18，卷4，頁377。

62 宋·惠洪，〈贈王性之〉，《石門文字禪》，《四庫全書珍本十集》（臺北：商務）冊219，卷2。案：「和仲」為蘇軾之字，見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

63 見宋·李之儀，〈仇池翁南浮集序〉，《姑溪居士文集·後集》，《宋集珍本叢刊本》（北京：線裝書局，2004），卷15，頁185；〈與王性之〉，卷17，頁193。仇池翁即蘇軾，以當時文禁森嚴，故諱言其姓名。

64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6，頁180。

65 宋·王應麟，《玉海》（上海：上海古籍，1992），卷139，頁677。

66 〈紹興七朝史〉，《玉海》，卷46，頁269；〈紹興重修哲宗實錄〉，《玉海》，卷48，頁309。

67 宋·黎靖德等編，《朱子語類》（臺北：文津，1986），卷138，頁3278。

68 《朱熹集》，卷71，頁3695。

「衰弱之甚」、「又恐非其所能及」，幾乎全盤否定了王銍一生的學術能力與成就，與北宋人所言、乃至同時代陸游所說的「記問該洽」、「予自少至老，惟見一人」等，⁶⁹恰成強烈之對比。朱熹對王銍的批判，影響後世甚鉅，因而明清人多半只記王銍多作偽書，而少有言其博學者，但還原到南北宋之間、乃至南宋中期以前，以王銍之學術聲望，對蘇詩的解讀能力，及曾搜集、編修蘇軾集的背景，被《百家註》作者注意，應該是相當合理的。

陳知柔（?-1184）在南宋初年，即是閩地著名學者，朱熹初仕時，曾從之於漳泉之間，此上文已述之。而需要說明的是，陳知柔在詩文上，亦有相當之造詣，王十朋乾道間出守泉州時，與陳知柔相識，即有〈贈陳體仁詩〉，稱其「胸中包古今，筆下真有神」，⁷⁰近人郭紹虞亦稱其為「蓋合道學與詩人而為一者」。⁷¹據宋人記載，陳知柔罷賀州守後，曾留惠陽三年，「暇日泛豐湖，登白鶴峯，追和東坡詩，陶寫羅浮風物殆盡」，⁷²白鶴峰是蘇軾貶謫惠州時居所之所在，豐湖是其時時遊憩之地，這應該是陳知柔泛舟登覽，並「追和東坡詩」以陶寫羅浮風物的主要原因。另陳知柔又作有《休齋詩話》，雖其書久佚，但郭紹虞《宋詩話輯佚》輯有佚文九條，其中「詩貴有野意」一條，幾乎全是由蘇軾論詩之語變化而成。⁷³由此看來，陳知柔對蘇軾的詩學顯然有一定之認同與特殊興趣。要之，陳知柔一則與王十朋相識，一方面又是一個對蘇詩有獨特興趣的著名學者，從這兩點來看他何以能夠成為《百家註》所錄注家之一，比起所謂的「南渡傳聞學者」，理由似乎更加充分一些。

69 《老學庵筆記》：「王性之記問該洽，尤長於國朝故事，莫不能記。對客指畫誦說，動數百千言，退而質之，無一語繆。予自少至老，惟見一人。」卷6，頁180。

70 《王十朋全集》，卷29，頁566。

71 郭紹虞，《宋詩話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154。

72 宋·章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1983影印），冊933，卷11，頁165。

73 陳知柔原文曰：「人之為詩要有野意。蓋詩非文不腴，非質不枯，能始腴而終枯，無中邊之殊，意味自長，風人以為得野意者，惟淵明耳。如太白之豪放、樂天之淺陋，至於郊寒島瘦，去之益遠。……」其中腴、枯、中、邊之說，主要係襲括蘇軾「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見蘇轍，〈蘇軾和陶詩引〉），及〈評韓柳詩〉（《蘇軾文集》，頁2109）的說法而成。「樂天淺陋」當出〈世傳徐凝瀑布詩云：「一條界破青山色」，至為塵陋。又偽作樂天詩稱美此句，有「賽不得」之語。樂天雖涉淺易，然豈至是哉！乃戲作一絕〉一詩（《蘇軾詩集》，頁1210），然其意已遭陳知柔篡改；「郊寒島瘦」語出〈祭柳子玉文〉（《蘇軾文集》頁1939）。

六、呂祖謙、張栻入選「百家姓氏」原因論析

張栻、呂祖謙是南宋理學大家，但被選入《百家註》的原因，應該都與理學關係不大。呂祖謙（1137-1181）為王十朋後學，與當代人一樣，對王十朋存有相當之敬意，但並無證據證明兩人之間有所往來，⁷⁴之所以列入「百家姓氏」，據筆者推測，主要可能有兩個原因：一、相傳呂祖謙曾為東坡詩分類，如今存最早的建安黃善夫家塾本，卷首「百家姓氏」欄內，在「東萊呂氏」條下即已注明：「祖謙字伯恭，分詩門類」。⁷⁵呂祖謙雖然四十五歲即英年早逝，然創作與學術成就極高，編書亦相當有名，除了著名的《皇朝文鑑》、《古文關鍵》之外，又曾按文體編選《標注三蘇文集》，加上其家學正是「論詩文必以蘇黃為法」，⁷⁶因此為蘇詩分別門類，似乎不無可能。問題是，各種呂祖謙的傳記及《東萊集》中，均未提及他分類編注東坡詩一事，因此呂祖謙是否曾為《百家註》「分詩門類」，遂成學術史上之公案。二、呂祖謙列入「百家姓氏」的另一個可能原因，是《百家註》中，的確有若干署名「呂」（「百家姓氏」中只有呂祖謙姓呂）或「伯恭」的注條，這一部分，據筆者統計，約有二十餘條，而且其中有許多是引述北宋人乃至蘇軾本人的說法以為注者，尤其彌足珍貴。呂氏本即家學淵源，《江西詩社宗派圖》作者呂本中，正是呂祖謙之伯祖。呂本中出身北宋巨室，高祖呂夷簡、曾祖呂公著均官至宰輔，數十年間，甄別拔擢人才無數，因而時人盛稱「天下之士，不出於韓，即出於呂」。⁷⁷呂本中祖父呂希哲即呂公著之子，紹聖初以黨爭貶，徽宗初年雖曾短暫起復，然尋又貶謫，自是流落淮泗之間逾十五年，然在淮泗間，「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⁷⁸不僅包括張耒在內的「四方有志之士，多不遠千里以從公」，⁷⁹程頤弟子楊時、

74 呂祖謙有〈王龜齡詹事挽章〉二首，其中有「今年襟上淚，三哭萬夫雄」之句，而自注曰：「芮祭酒、劉太史，皆以今歲下世，故云」，可見其對王十朋之敬意。然除此之外，似無二人交游的相關資料。上引詩見呂祖謙著，呂祖儉、呂喬年編，《東萊集》，見《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1983影印），冊1150，卷1，頁6。

75 引自劉尚榮，《蘇軾著作版本論叢》，頁61。

76 朱熹〈答呂伯恭〉：「舍人丈（案：即呂本中）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為法」，《朱熹集》，卷33，頁1413。

77 邵伯溫，《聞見前錄》，卷3，周光培編，《宋代筆記小說》，冊5，頁66。

78 《宋史·呂希哲傳》，卷336，頁10778。

79 見呂祖謙，〈題伯祖紫微翁（按：即呂本中）與曾信道手簡後〉，《東萊集》，卷7，頁65。

謝良佐以師禮事之，饒節、謝逸、汪革等江西詩人亦「奉几杖侍左右如子姪」，⁸⁰在蘇軾、黃庭堅、二程等相繼謝世，蘇轍亦避居穎濱、謝世不出之後，呂希哲隱然成為當時士林領袖之一，身為長孫的呂本中，亦因而得以應接賓客，並與饒節等人及其他江西詩人「論文會課，時時作詩」、往來酬唱不絕，⁸¹江西諸人，甚至一度期許呂本中為文壇主盟，⁸²加上呂祖謙本身學術聲望亦高，因此受《百家註》作者重視，並不難理解。只是「百家姓氏」既收錄《江西詩社宗派圖》中的所有詩家，又如此重視呂祖謙，然「百家姓氏」中，卻獨不見呂本中——換言之，最初的《百家註》，可能是未收呂本中的，其原因為何？便頗令人玩味。

《江西詩社宗派圖》的作成時間，雖然至今學術界尚有爭議，然而至遲在胡仔的《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中，即已具錄其事及此圖所收詩家姓名，⁸³而據胡仔〈自序〉，《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乃成書於紹興十八年（1148），時王十朋三十七歲，而呂本中則於更早的紹興十五年（1145）即已謝世，因而無論呂本中作《宗派圖》時間為何，都不影響王十朋取用以作《百家註》。胡仔是《王註》「百家姓氏」之一，自然可能是《百家註》搜輯江西詩人資料所依據者；但正如前文所述，南宋初年，宗蘇、宗黃其實已形成不同的學術社群，「江西宗派」一詞，更曾直接出現在王十朋的作品中，⁸⁴因此即使《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是今日所見有關《宗派圖》最早的記錄，但《百家註》所收江西詩人，與《宗派圖》高度疊合，在當日又不見得即無其他可能之來源。要言之，《百家註》雖然對江西詩人的概念，與《宗派圖》大略相同，但這一概念，卻不見得是直接來自於呂本中的原作，這或許是「百家姓氏」最初並未收入呂本中的主要原因。

如果「百家姓氏」不收呂本中的原因如上述，則呂祖謙何以入選「百家姓氏」，便值得進一步辨析。正如上文所說，呂祖謙乃王十朋後輩，雖然對王十朋充滿敬意，但並無證據可以證明兩人之間有所往來，而且王十朋逝世之時，呂祖謙亦不過三十五歲，如此，則如果呂祖謙是因「分詩門類」而列入百家之

80 同上註。

81 以上敘述，略本呂本中之《師友雜誌》（清光緒三年吳興陸心源十萬卷樓重刊本），及呂祖謙，〈題伯祖紫微翁與曾信道手簡後〉，《東萊集》，卷7，頁65。

82 呂本中，《師友雜誌》：「政和初，無逸（即謝逸）至京師省試，嘗寄予書，極相推重，以為當今之世，主海內文盟者，惟吾第一人而已。」

83 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卷48，頁327-328。

84 見註47所引。

中，則「分詩門類」是在王十朋生前，或在王十朋身後，便不無疑問。⁸⁵其次，若呂祖謙入選的原因，是因《百家註》中多引其說以爲注，則現今可見王十朋的作品中全未提及此人，似乎亦不甚合理。因此，筆者以爲，呂祖謙之入選「百家姓氏」，甚至現存《百家註》中有關呂祖謙的註條，爲後人所羈入的可能性甚大，而這也是本文在掘發「百家姓氏」與王十朋的密切關係後，仍不能遽然斷定《百家註》最初即成於王十朋之手的最主要原因。

至於張栻（字敬夫，又字欽夫、樂齋，號南軒，1133-1180），依王文誥的說法，他所謂的「南渡理學閩支大宗」，因爲蘇軾曾贈詩張競辰（字熙明），勉其子張浚（字德遠，1097-1164）「爲實學」，因而與蘇軾有間接之關係，而張栻「又德遠子也」，於是順理成章，成爲《百家註》成員之一。然而如上文所論，不僅所謂「理學閩支大宗」的理由站不住腳，而且所謂蘇軾贈詩張浚父一事，亦未得其實。蘇軾北歸途中，確曾贈詩張熙明，題爲〈張競辰永康所居萬卷堂〉，⁸⁶張競辰子名德遠，然與「字德遠」之張浚，卻實爲二人。張浚父爲張咸（1048-1100），字君說，綿竹人，乃元豐三年進士，元祐初詔復六科，哲宗親擢第一，其世系與生平事蹟，《全蜀藝文志》卷四十七所收之〈奉議郎張君說墓誌銘〉載之甚詳。至於張熙明之子張德遠，則王明清《揮麈後錄》卷三嘗略及之：

華陽張德遠，文老子蒙之婿也，又（盛）并娶德遠之妹……東坡先生賦張熙明〈萬卷堂詩〉，即其父也。⁸⁷

因此，以蘇軾贈詩張熙明，而將張浚或張栻和蘇軾扯上關係，根本便是一項謬誤。

雖然如此，但張栻之入選「百家姓氏」，卻的確可能與張浚不無關係。張浚是南宋初年之名臣、名將，尤其建炎間經略關陝，使飄搖之宋廷得以稍事喘息；以及紹興初與趙鼎共同主政，「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使動蕩之局勢又以之略爲安輯，⁸⁸最爲人所稱道。在南宋初年宋金和戰的爭議中，張浚以主戰而擯斥，更由於秦檜之忌憚，而「去國幾二十載」，⁸⁹「百家姓氏」中，所謂的「南渡登朝，多有忤賊檜而致禍者」，其實多是這一類人物，

85 清康熙間楊瑄曾云：「東坡先生詩分類本創始於呂東萊先生，集成於王梅溪先生。」今人劉尚榮已斥爲「未明所據，亦不足爲憑。」見《蘇軾著作版本論叢》，頁61。

86 《蘇軾詩集》，卷45，頁2452。

87 王明清，《揮麈後錄》，周光培編，《宋代筆記小說》，冊2，卷3，頁381。

88 詳見《宋史》，卷361，頁11303-11311。

89 同上註，頁11306。

其餘如劉子翬、劉珙叔姪，亦是力主恢復，龔茂良雖主和議，卻是磊落獨立，而不與秦檜同流，如果真有所謂的「德遠氣類所聚」，或許應從這個角度來看，會更合理。這之中，張浚又是王十朋之尤為欽敬者，不僅紹、乾之間曾上書論用兵事宜，力主起用張浚，⁹⁰之後張浚以符離之挫而貶，王十朋且因此上書自劾，即使當時形勢險峻，但在〈自劾劄子〉中，王十朋仍毫不隱諱其對張浚的敬意，曰：

臣素不識張浚，聞浚天姿忠義，誓不與敵俱生，天下聞浚之名，必以手加額，蓋忠義人心所同，臣實敬慕之。⁹¹

而張浚沒後，王十朋復又對張栻提攜不遺餘力，先是舉張栻以自代，⁹²乾道間，張栻因張說事忤時相虞允文而貶袁州，時已臥病致仕，自稱「懵然不知時事」的王十朋，又上書虞允文，為其說項，⁹³愛惜之意，不言可喻。以《百家註》和王十朋關係之密切，則張栻之入選「百家姓氏」，其原因便不難理解；即使張栻是《百家註》後來的編定者自行加入註家名單的，然以張浚父子於政事學術上之聲望，以及王十朋與父子二代之關係，這樣的安排，亦不無見地。

七、結論——兼論《百家註》評價之商榷

由上文對「百家姓氏」的討論中，可以看出，《百家註》之「網羅宏富」，並非是毫無章法的胡亂湊泊而成。從「百家姓氏」看來，《百家註》所引用者，有《百家註》作成之前主要的《東坡詩註》，有與王十朋關係密切的親朋僚屬，有南北宋之間作為詩歌主流的江西詩人，以及當時重要的詩文名家、學者、剛直名臣等，在在顯示這是一份經過精心採擇以形成「詮釋社群」，而非但務貪博的名單，因而置之於蘇軾研究史或宋代文化史上，便有其獨特、甚至值得更進一步開發、探賸之意義，茲簡述如下：

（1）十註，以及十註之外，可能亦為《百家註》作者取以為主要參照座標的其他《東坡詩註》，在當時，固然為《百家註》作者提供了「具列異同」、⁹⁴

90 〈論進取利害劄子〉，《王十朋全集·文集》，卷3，頁616。

91 〈自劾劄子〉，《王十朋全集·文集》，卷4，頁634。

92 〈舉張栻自代狀〉，《王十朋全集·文集》，卷4，頁647。

93 〈與虞丞相〉，《王十朋全集·文集》，卷21，頁941。

94 南朝宋·裴駰，〈史記集解序〉，見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漢京，1983），頁22。

「刪煩補略，裁以己說，遂成一家」⁹⁵的基礎材料，然時至今日，即使刪補之間，未能盡如人意，但許多宋人對東坡詩的說解，藉此書得以留存，「足供後人掇拾之資」，這一點，其實也是一般人對這本著作最直接的印象，甚至是唯一的好評，因此已毋庸贅言。

(2)《百家註》是否出自於王十朋之手，自清康、乾以來，數百年間，聚訟不休。主張《百家註》為王十朋手著者，如王文誥，對這本著作固然不無過分揄揚之嫌，然如果一味將之歸於書肆妄人所集，則又已預先對此書懷有成見，因此亦無法公正評價此書。而本文透過對「百家姓氏」之梳理，則發現《百家註》所收注家中，有近半與王十朋有往來關係，其中更有近三分之二，是與王十朋關係密切之親朋僚屬，且於其他宋人文獻中，已難以考知者，由此，幾乎已可斷定，《百家註》即使不是王十朋親手編成，但與王十朋亦非絕無相關，筆者更以為，《百家註》或許不無是王十朋後學根據其初稿或記錄作成之可能。

《百家註》所收注家與王十朋關係如此之密切，是前人未曾論及之處，而由此出發，則以王十朋為中心，圍繞於其四周的文人網絡，尤其是江浙一帶，一般活躍於地方學術社群的文人，為何熱中於談論東坡詩？而其言說有那些要點或重要模式？似乎都是可以更深入探討，以了解蘇詩於南宋初年流傳狀況的地方。

(3)《百家註》所收，涵蓋了《江西詩社宗派圖》全部二十六位詩家，如果加上其餘與江西詩派關係密切的詩人，如秦觀、蘇庠、曾紆、劉子翬、汪藻等，則幾占整個「百家姓氏」三分之一之比重。《百家註》之著意以江西詩人為搜羅核心之一，從當時的文學環境來說，一則應有標舉江西正宗的意味，二來又有以江西乃蘇軾法嗣，並以之作為詮解蘇詩權威的作用，在宗蘇、宗黃已成一項重要議題的南宋詩壇，這其實是頗有調和蘇、黃的意義在內的。

正如上文所說，「百家姓氏」之特別標舉南北宋之間作為詩歌主流的江西詩人，以及當時重要的詩文名家、學者、剛直名臣等，在在顯示這是一份經過精心選擇的名單，而對照當今學術界對這段時間文學發展的理解，則「百家姓氏」之收或不收，都頗有其耐人尋味之處。例如，文學史上所謂江西詩派三宗之一的陳與義（1090-1138），在北宋末年，即已頗富盛名，渡江之後，國破家亡、顛沛流離之痛，更使他的詩歌造詣登峰造極，從後世的眼光視之，則時人幾無能出其右者。然而「百家姓氏」中，儘管有約莫三分之一為《江西詩社宗派圖》或與其詩學關係密切之詩人，但卻對陳與義視而不見，這對江西詩派或陳與義本人詩歌的接受與建構史的研究而言，可能均不無參考之價值，只是

95 宋·陳振孫著，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正史類·漢書》（上海：上海古籍，1987），頁100。

這已超出本文之論旨及所能處理的範圍，因而此處只能暫時從略。

(4) 至於「百家姓氏」所收者，則在比較《王註》與《施註》，乃至今存其他宋人注本之殘帙時，尤其能顯出它的詮釋意向以及價值之所在。《施註》最初是施元之病前人之註「缺略未究」，於是在顧禧協助之下，「遂因閒居，隨事詮釋，歲久成書」的作品，在他亡故後二十餘年、即嘉泰二年中，其子施宿才出此書，請陸游爲之序。⁹⁶陸游在〈序〉中舉自己與范成大論東坡詩兩三事爲例，婉轉的表達了對此書「專重典故，少註時事，未能闡發東坡作詩本旨」⁹⁷的遺憾，施宿因此補註乃父與顧禧之原作，以人物時事爲主，而成《施註》「題左註」的部分，總約三百五十餘條，五萬二千五百七十餘字，鄭騫先生以爲，這是《施註》最重要最精采的部分，而且「每逢提到神、哲兩朝政局人物，其議論一貫的反對王安石以次的新法派，而推崇東坡及元祐諸公」，⁹⁸由此，不難看出《施顧註》除了解讀東坡詩之外，其實還頗有評價北宋中葉新舊黨爭以來之歷史及人物的用意，然而這一方面，卻正是《王註》所缺乏的，因而學界向有「王本長於徵引故實，施本長於臧否人倫」⁹⁹之說。在「徵引故實」方面，《施註》是否即不如《王註》，或許尚有討論的空間，然而在臧否北宋政局人物方面，《王註》的確不無迴避，卻是事實。

二十世紀六〇年代中，日本學者小川環樹、滄田淳之助等人，曾從保留在日本的禪僧講稿中，輯出趙次公《東坡詩注》殘稿三十九卷及補遺一卷，收於《蘇詩佚注》這本書之中。趙次公即十家注之一，而且亦在《王註》所採百家之列，筆者因而取與今本《王註》比對，結果發現原本趙注中言及北宋中葉以來之政局及人物的部分，到了《王註》中，幾乎被刪削及改易殆盡（見附表二），可見《王註》之鮮少論及北宋政局，似乎是刻意有爲的結果。而這一點，王文誥亦曾致疑：「王註百家，半皆紹符崇觀之人，親見黨禍翻覆，豈無不避諱指斥時事者流？」王文誥的解釋是，這是由於「王（十朋）皆刪去」之故，其原因，即在於評論北宋政局人物，在南宋的複雜局勢中，有時仍不無必須隱諱的苦衷，而這也是陸游不肯、亦不能注東坡詩的最主要原因。¹⁰⁰然而筆者以爲，

96 見施宿，〈註東坡先生詩序〉，《蘇詩佚注·附錄》。

97 鄭騫先生語，見《宋刊施顧註東坡詩提要》，第3節，頁6。陸游，〈施司諫註東坡詩序〉，則見《陸放翁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90），頁83-84。

98 關於施顧註成書經過及內容，詳見鄭騫先生，《宋刊施顧註蘇東坡詩提要》，第2-5節，頁3-18。

99 《蘇詩佚注·凡例》，頁1。

100 《總案·凡例》，頁3下-4上。

由於《王註》在南宋中期以後，即被書肆大量翻刻，並以此廣泛留傳在士人之間，因此上文所述的刪削、改易等，究竟是原著即已如此，或後來之書肆所爲，已不可考知。但這樣的刪削，不無去除特定人、事、物的背景干擾，使讀者就詩論詩、就詩讀詩的作用，而這樣刪去政治背景，其實也即是刪去許多探究蘇詩中「微言大意」之可能的一部「東坡詩註」，能在南宋中期以後蔚然成風，與當時詩壇漸次不重事實、惟務字句的風氣，顯然是互相呼應的。另外，就「臧否人倫」而言，《王註》或許不如《施註》之立場鮮明，然而其中所收的江西詩人，南北宋間重要的詩文名家、學者，以及南宋初年的剛直名臣等，其實也已經爲當代標舉了若干文化界的重要士人典範。換句話說，《施註》之作，固然表達了施家父子——尤其是施宿個人——對北宋神、哲兩朝的歷史觀點，然而《王註》的作者，在透過「百家姓氏」以建構其「詮釋社群」之時，其實也已經對南北宋之間、尤其是南宋初年的文化及政局做了其個人的若干判別，透過書肆的傳刊、風行，也必然獲得了南宋士人一定程度的認可，這是我們論及這部著作時，不應輕忽的一個事實。

總而言之，所謂的「注釋」，最初當然是爲了解讀、或趨近作者的原意而作，但在註家「具列異同」、「刪煩補略、裁以己說」後，註釋本身其實便已沾染了註家的主觀色彩，甚至負載了註家所處時代的某些文學觀念及文化意義。在近代蘇詩研究風氣大盛，舉凡纂集、校釋以及各種論述資料相繼出土，相關的期刊論文以及專著不勝枚舉的情況之下，不論《施顧註》或《王註》，其實在詮解內容上都已嫌不足，近年來，更幾已爲清人及近人之註本完全取代，因而對兩本宋人所作《東坡詩註》強分軒輊，甚至爭論其著成時代之先後，並以上述爭辯的結果抑揚其價值的作法，是否仍有必要，其實是相當值得商榷的。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無論《施顧註》或《王註》，其時代性，又都是後來即使在詮釋上更深微、更精當的註本或論說所無法取代的。對《王註》的評價，或許必須從這個角度著眼，重新予以評估，才不致陷入傳統的泥淖中，反而忽略了這本著作於文本詮釋之外所負載的其他訊息。

附表一

說明：

一、本表主要係根據《百家註》、王文誥《總案》，以及《王十朋全集》（簡稱《王集》）編成，然視個別狀況，亦參考其他文獻及史料。

二、樂清與永嘉相近，故家永嘉者，王十朋亦往往稱之為鄉人，本表從之。

| 姓名字號 | 關係 | 見於《王集》處 | 備注 |
|--------------------|-------------------|------------------------|--|
| 丁惠安（又名康臣，字道濟） | 王十朋僚屬 | 509、542 | 王文誥：永嘉人，官溫陵宰。案：王十朋於孝宗乾道四至六年間知泉州（即溫陵）。 |
| 丁鎮叔 | 王十朋鄉人。 | 487 | 永嘉人。乾道四年八月，王十朋起知泉州，過福唐，有〈至福唐會鄉人丁鎮叔、張器先、甄雲卿、項用中、趙知錄、薛主簿、同年孫彥忠，草酌試院〉詩。 |
| 毛叔度（初名公弼，字虞卿，後改名宏） | 王十朋鄉人，為遠房表兄弟。 | 6、8、9、18、21、37、783、965 | 登乙丑第（紹興十五年），官主簿。工賦，嘗笑王作詩而不事舉業。〈表叔陳景韶挽詞〉云：「毛叔度其甥也」，則毛為王十朋遠房表兄弟。 |
| 王百朋（昌齡） | 王十朋弟。 | 甚多，不列舉。 | |
| 王壽朋（夢齡） | 王十朋弟。 | 甚多，不列舉。 | |
| 吳芾（明可） | 早年曾為王十朋家鄉樂清縣尉。 | 475、481、538 | 紹興五年，吳芾於臥龍坊建新學，令王十朋作縣學落成百韻以頌（〈用貢院韻寄當塗給事明可〉）。今王十朋集中有〈次韻吳明可見寄〉云：「閩楚相望天一涯」，作於王知泉州之時；吳芾《湖山集》中亦有〈送王龜齡得請還鄉〉詩，知至晚年，王仍與之有詩歌往來。 |
| 吳憲（字知叔） | 福唐帥，王十朋知泉州時識之。 | 487、497 | |
| 宋彥才 | 鄉先生，永嘉耆舊。 | 38、788 | 王文誥：「永嘉人，早業儒，後以禪悟，年七十卒。」生平詳見王十朋〈代祭宋彥才文二首〉。 |
| 沈敦謨（名希臯） | 王十朋讀書鹿岩書院，從潘翼先生學時 | 278、485、539 | 名希臯，瑞安人。（〈寄沈敦謨〉自注）乾道四年，王十朋赴泉州道上，有〈贈 |

| | | | |
|-------------------------|-------------------------------|---|--|
| | 之同學，老於青衫者。 | | 沈敦謨詩〉云：「三十年前硯席同」，則沈當是王十朋讀書鹿岩書院，從潘翼先生時之同學。詩又云：「徒勞州縣知何補，高蹈丘園不是窮」，王文誥以爲沈乃「老於青衫者也」，得之。 |
| 汪涓（養源） | 紹興三十年，王十朋與之同考殿試。 | 527 | 〈悼汪舍人養源〉有句云：「伯仲同持橐，聲名壓縉紳。」 |
| 汪應辰（原名汪洋，字聖錫，進士第一，賜名應辰） | | 910； | 紹興三十年（1160）爲秘書省校書郎之時，汪應辰同居館職（〈與王運使〉）。汪應辰後爲王十朋作墓誌銘。 |
| 林季任（字明仲） | 鄉人。 | 237、278、471 | 家梅嶼，與梅溪相近。紹興三十一年，王十朋歸省先隴，曾於其城西別館假之踰月。見頁533，〈林主簿明仲挽詞〉。 |
| 林致約 | 泉州尉。 | 567、568 | 永嘉人。乾道六年（1170）離泉州，有〈越境送別者七人：蔣元肅、黃少度、鹿伯可、趙元序、陳德溥、葉飛卿、林致約，少酌驛舍〉詩，詩中稱七人爲「同僚」。 |
| 芮燁（字國器，一字仲蒙。） | 烏程人。 | 550 | 紹興十八年進士，《宋史翼》卷十三有傳。王十朋集中唯有〈林黃中少卿出守吳興芮國器司業以詩送之有今日桐城王刺史異時遺愛在吾州句用韻寄二公〉一詩提及芮燁，據《宋史翼》，芮燁「乾道五年除國子司業，旋升祭酒」，則詩當作於乾道五年，時王十朋守泉州。王、芮兩人交游情況已不可考，然芮燁紹興三十一年嘗除秘書省正字，時王十朋亦官秘書省，兩人或結識於此時。 |
| 胡銓（字邦衡） | 隆興初，王與胡同爲起居舍人，同奏史職廢壞者四事，上皆從之。 | 262、263、264、270、526、536、546、914、606、966 | 生平詳見《宋史》。 |
| 孫彥忠 | 王十朋同年。王十朋初釋褐僉判紹興時，即與之爲友。 | 487 | 會稽人。乾道四年八月，王十朋起知泉州，過福唐，有〈至福唐會鄉人丁鎮叔、張器先、甄雲卿、項用中、趙知錄、薛主簿、同年孫彥忠，草酌試院〉詩，詩中自注曰：「彥忠會稽人，予昔仕越， |

| | | | |
|----------|------------------|---|---|
| | | | 與彥忠友」。 |
| 孫 稿（子尚） | 王十朋鄉學同窗。 | 7、11（二首）、12、15、23、31、37、211、965 | 開封人。王十朋弱冠從林師禹於金溪，與季仲默、孫子尚同窗，紹興十五年卒，年僅三十二。葬會稽山大禹寺之側，王十朋僉判會稽時，嘗訪其墳植柏。 |
| 崔 雍（肅之） | 王十朋饒州僚屬。 | 492、541 | 〈崔肅之自湖至泉遷二親之喪歸塋詩以送之〉稱崔爲「番水同僚舊」，知崔爲王在饒時同僚。 |
| 張孝祥（字安國） | 同僚、詩友。 | 313、314、315、316、317、319、506、527、 | 相識年月不詳，但約在乾道元年前後，時王十朋知饒州，張孝祥在洪州，兩人唱酬詩歌甚多。安國早卒，王有詩悼之。 |
| 張 棧 | 張浚子。 | 647、941 | 王十朋曾舉以自代，並爲其上書時相虞允文。 |
| 張器先 | 王十朋鄉人。 | 277、278、487、1003 | 永嘉人。登乙科，官福清丞。見丁鎮叔條。 |
| 曹夢良 | 王十朋鄉學同窗，後又爲太學同舍。 | 82、137、189、240、241、259、485、495、539、1006 | 瑞安人。曹夢良初與王十朋同學於鄉校（金谿），後又同舍太學，並同登第（見〈和答張徹寄曹夢良〉、〈祭曹夢良文〉）。嘗官嚴陵掾。 |
| 陳元佐（希仲） | 從王十朋於梅溪學館。 | 71、115、251、661 | 見〈梅溪題名賦〉。 |
| 陳元龍 | 王十朋同年。 | 552 | 見〈送陳元龍赴封州教官〉詩。 |
| 陳知柔 | 王晚年守泉州時識之。 | 566 | 王十朋守泉時識之，對其推崇備至。見〈贈陳體仁〉詩。 |
| 陳德溥（孔光） | 王十朋守泉州時同僚。 | 567、568 | 見林致約條。 |
| 鹿何（伯可） | 王十朋守泉州時同僚。 | 568 | 紹興三十年進士。參林致約條。 |
| 喻叔奇 | 王十朋同年進士。 | 194、195、196、197、200、210、215、221、265、320、386、423、453、468、537、961 | 紹興二十六年，王、喻同舍上庠，二十七年（1157），王十朋爲高宗親策狀元，喻叔奇與兄伯壽爲同榜進士（〈寄題喻叔奇亦好園〉）。明年，王十朋僉判會稽，喻叔奇亦攝職會稽，兩人「論文賦詩，相得愈厚，盍簪才百日，唱和無慮百數篇」（〈送喻叔奇尉廣德序〉），自是十餘年，詩文往來不絕（王卒 |

| | | | |
|--------------|-----------------------------|--|---|
| | | | 於1171年)。 |
| 程天祐 | 不詳。 | 487 | 〈贈程天祐秀才〉詩：「程生嗜好與人殊，杖履遙遙訪我廬。不踏槐花隨舉子，手持醫國惠民書」，知程或為有才而避世者。 |
| 項用中 | 王十朋鄉人。 | 487 | 永嘉人。見丁鎮叔條。 |
| 馮方（字圓仲，一作員仲） | 紹興三十至三十一年，王十朋、馮方同官秘書省，相繼論事。 | 224、235、260、536、914、917、921、967 | 〈次韻馮員仲正字湖上有作〉稱馮為「正字」，〈與王總領〉一文又云「某與馮圓仲一二同舍皆請外」，知二人同官秘書省。《宋史·王十朋傳》：「金將渝盟，十朋輪對……秦檜久塞言路，至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為〈五賢詩〉述其事。」《宋史》所記為正是紹興三十一年王、馮同官秘書省時事。 |
| 黃少度 | 王十朋守泉州時同僚。 | 568 | 見林致約條。 |
| 萬庚（字先之） | 王十朋鄉人、太學同舍。 | 51、53、57、58、60、61、76、129、134、241、535、809 | 王十朋與萬庚早年曾同舍上庠，萬庚雖早以上舍免省，登進士科（〈東平萬府君行狀〉），然仕途不達，故王〈哭萬先之〉云：「太學時名重，吾鄉德譽崇。才華蓋天祿，官職止儒宮。」 |
| 萬庠（字申之） | 王十朋鄉人。 | 129、663、809 | 萬庚之弟，樂清自舍法罷，閱二十年無舉於鄉者，邑人復取鄉貢自萬庠始（〈東平萬府君行狀〉）。嘗從王十朋於梅溪學館（見〈梅溪題名賦〉），誼在師友間。 |
| 萬椿（字大年） | 王十朋表弟。 | 50、51、64、65、129、266、277、553、554、555 | 王十朋母萬氏（〈東平萬府君行狀〉：「某，萬出也。」），與萬椿為中表。早年亦曾相從於梅溪學館。 |
| 葉思文 | 王十朋鄉人。王十朋官泉州時見之。 | 523 | 王十朋有〈興化簿葉思文吾鄉老先生也比沿檄見訪既別寄詩二十八韻此韻以酬〉詩，時王十朋知泉州。 |
| 葉飛卿 | 泉州同僚。 | 552 | 永嘉人。乾道六年（1170）王十朋離泉州，有越境送別者七人，葉飛卿為其中之一，時為泉州丞。 |
| 賈循（巖老） | 王十朋妻弟。 | 494、495、813 | 見〈賈府君行狀〉；王文誥《王註姓氏》。 |
| 甄雲卿（字龍） | 王十朋鄉人。 | 487 | 永嘉人。《齊東野語》言其「少有俊聲， |

| | | | |
|----------|--|---------------------|---|
| 友) | | | 詞華奇麗，而資性浮薄」；《庶齋老學叢談》錄其〈題赤壁〉詞一首。 |
| 趙元序 | 宗室，王泉州同僚。 | 568 | 參林致約條。 |
| 趙若拙 | 王十朋識於守夔時，稱其「卓爾不群，佳公子也」。 | 406、410、489 | 宗室。世以趙德麟目之。守果州，移成都漕。 |
| 劉珙 | 珙「官中秘，直西省」，皆與王十朋同僚，王對其知顧甚厚。 | 附錄 | 朱熹代劉珙作〈宋梅溪王文忠公文集序〉。 |
| 蔣元肅 | 泉州同僚。 | 550、564、568、956、968 | 〈別蔣元肅〉云：「經橫講席見淵源」，〈讀禮堂記〉則云：「元肅於禮，既飽讀而躬行之，又以是而教學者，南方多士，其有立於禮乎？」疑元肅乃泉州學官。 |
| 薛士昭（字伯宣） | 王十朋鄉人，約識於王十朋三十多歲時。王五十七至五十九歲守泉州，復相逢於泉州。 | 497、506、513、518、531 | 見〈送薛士昭〉詩、〈薛士昭寄新柑分贈知宗提舶知宗有詩次韻〉等。 |
| 龔茂良（字實之） | 紹興間曾與王十朋同事史館。乾道七年，王十朋提舉江州太平興宮，龔時為江西帥。 | 547、548、958 | 見〈廣州重建學記〉，及王文誥《王註姓氏》。 |

附表二

| 原文 | 王註（頁） | 蘇詩佚註（頁） |
|---|---|--|
| 〈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歸田雖賤辱，豈失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勿厭藜羹。」 | 厚：《莊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陶潛《貧士詩》：「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王子淵《頌羹藜》：「含糗者不足以論太牢之味。」韓愈《垂雲詩》：「藜羹尚如此，肉食安可常。」（165） | ……言田事亦在泥中，然無督役之勞，故宜毋厭藜羹，此不盡之意也。公《烏臺詩話》云：「……以譏諷朝廷開運鹽河不當，以妨農事。」（144） |
| 〈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胡不學長卿，預作封禪詞。」 | 援：司馬相如未死時，著書一卷，言封禪事，既死，武帝求得之。（313） | 亦激憤之言也。若林和靖云：「猶喜家無封禪書」，則又擺落永進之意。（144） |
| 〈次韻答章傳見贈〉：「馬融既依梁，班固亦仕竇。效顰豈不欲，頑質謝鐫鏤。」 | 次公：先生詩案云：「熙寧六年正月作此詩」，言某不能效班馬二人苟容依附也。（314） | 先生《詩話》自言與章傳干涉事。熙寧六年作詩云……此詩引梁冀、竇憲，並是漢時人，時君不明，遂躋顯位，驕暴竊威福用事，而馬融、班固二人皆儒者，並依託之。軾詆毀大臣執政如冀、憲，軾不能效班、馬二人苟容依附也。（146） |
| 〈徑山道中次韻答周長官兼贈蘇寺丞〉：「奈何效燕蝠，屢欲爭晨暝。」 | 次公：小說載蝙蝠與燕爭，晝夜不決，往問鳳凰，鳳凰方睡，遂投訓狐，其事詳見詩案，且云：某意以譏王庭老如訓狐，不分別是是非也。（315） | 案：譏王庭老。今《詩話》言：「日正晨其急」，熙寧九年，王安石免相，王庭老集賢相。（156） |
| 〈次韻景仁留別〉：「欲參兵部選，有力誰如罽。」 | 次公：《朝野僉載》云：崔湜為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白湜曰：某能翹關負米。湜笑曰：若壯，何不求選兵部？答曰：外議謂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得選。左傳曰：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385） | 此以譏選舉之不公也。（156） |
| 〈送范純粹守慶州〉：「浮雲無根蒂，橫潦能須臾。」 | 援：退之詩：「浮雲柳絮無根蒂。」續：退之詩：「橫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395） | 浮雲無根，橫潦須臾，乃若浮雲、橫潦之不耐久也，故經事有成敗而人之賢愚見矣。此必當時之事，有斯輩人也。（184） |
| 〈劉莘老〉「遂與屈子鄰」。 | 援：屈原流放江濱。（464） | 言取屈原放逐江潭而非其罪，今劉摯為言新法不便，謫官湖南，故言與屈子相鄰也。（142） |
| 同上：「芻狗難重陳」。 | 厚：《莊子·天運篇》：「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464） | 莊子詆毀孔子，言孔子所陳先王之陳跡，譬如已陳之芻狗，難再陳也。意亦以譏當時大臣在田里之時，自比伊尹、太公，出而試用，乃大繆戾不可施用也。（142） |

引用書目

- 宋·蘇軾著，舊題宋·王十朋集註，《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四部叢刊》。
- 宋·蘇軾著，宋·施元之等註，清邵長蘅補註，《施注蘇詩》，臺北：廣文書局，1978影光緒南海孔氏覆刻古香齋本。
- 宋·蘇軾著，清·馮應榴輯注，黃任軻、朱懷春校點，《蘇軾詩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宋·蘇軾著，清·查慎行註，《蘇詩補註》，臺北：新文豐1979影香雨齋本。
-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 宋·李之儀，《姑溪居士文集》，《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04影清鈔本。
- 宋·趙令畤著，孔凡禮點校，《侯鯖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
- 宋·惠洪，《石門文字禪》，《四庫全書珍本》，臺北：商務印書館。
- 宋·呂本中，《師友雜誌》，清光緒三年吳興陸心源十萬卷樓重刊本。
-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
- 宋·任淵著，劉尚榮校點，《黃庭堅詩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 宋·汪藻，《浮溪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
- 宋·孫覿，《鴻慶居士集》，《四庫全書珍本》。
-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百部叢刊集成本》，臺北：藝文印書館。
- 宋·王十朋著，《梅溪集》重刊委員會編，《王十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宋·張元幹，《蘆川歸來集》，上海：上海古籍社出版，1978。
- 宋·陳振孫著，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宋·呂祖謙著，宋·呂祖儉、呂喬年編，《東萊集》，《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
- 宋·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 宋·朱熹，黎靖德等編，《朱子語類》，臺北：文津，1986。

- 宋·陸游，《陸放翁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90。
-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北京：中華，1979。
- 宋·黃震，《黃氏日抄》，東京：中文，1979據日本立命館大學圖書館藏書影印。
- 宋·周必大，《周益公集》，《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04影明澹生堂鈔本。
- 宋·吳垞，《五總志》，百部叢書集成本。
-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臺北：木鐸，1982。
- 宋·王應麟，《玉海》，上海：江蘇古籍，1992。
- 宋·章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
-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臺北：新興書局，1958。
- 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 元·方回，《瀛奎律髓》，臺北：藝文，1964。
- 清·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成都：巴蜀書社，1985。
- 清·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4。
- 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91。
- 清·吳之振等輯，《宋詩鈔》，上海：三聯，1988。
- 清·陸心源輯，《宋史翼》，北京：中華書局，1991。
- 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 葉德輝，《郇園讀書志》，臺北：明文，1990。
- 錢鍾書，《宋詩選註》，臺北：新文豐，1989。
- 鄭騫，《宋刊施顧註蘇東坡詩提要》，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
- 郭紹虞，《宋詩話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
- 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臺北：華正，1981。
- 周光培編，《宋代筆記小說》，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 劉尚榮，《蘇軾著作版本論叢》，成都：巴蜀書社，1988。
- 謝思煒，《唐宋詩學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漢京，1983。
- 日·小川環樹、滄田淳之助編，《蘇詩佚注》，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中國文獻學研究班，1967。

Reevaluating the *Classified Poetry of Dongpo*
with *Hundred Critics' Annotations*:
A Discussion of the Annotators' Names
Classified by Wang Wen-gou

Lee, Chen-huei*

Abstract

Under the stereotypical impression as a forged publication made by booksellers, the *Classified Poetry of Dongpo with Hundred Critics' Annotations* (abbr. as *Hundred Critics' Annotations*) was hardly respected except as a rich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for hundreds of years. In fact, not only whether the *Hundred Critics' Annotations* is completely a forged book made by booksellers remains discussible; bu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notation books for Dongpo's poetry that survived from Song Dynasty,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was irreplaceable by later works or dissertations, even if they are more precise or profound than it. Based on the reorganiz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so-called "the Hundred Annotators' Names" made by Wang Wen-gou, a Ching Dynasty scholar,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late the Hundred Annotators to Wang Shi-pong (who was once identified as the editor of the book), to the Jiangxi poets, and to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cademic and political elite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The study, then, helps to reevalu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undred Critics' Annotations* for the research of Su Shih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as well as puts forth some valuable proposi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Keywords: *Hundred Critics' Annotations*, the Hundred Annotators' Names, Wang Shi-pong, Su Shih, Wang Wen-gou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Tsing Hua University.